

今年2月6日是李一氓同志(1903-1990)诞辰110周年。李老既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又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在他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从事过地下工作、军队工作、保卫工作、政权建设工作、宣传教育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外事工作，以百折不挠、襟怀坦荡、博学多才而为人们所崇敬。李老于1975年调到中联部担任领导，此后的十年我有幸在他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的学者风范感触至深。

李老树立严谨治学的榜样。他不仅善于从政治角度，而且更多关注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国际问题。他经常对我说，研究苏联问题要从该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把握全貌，要了解它的历史，要有发展的眼光，又要把苏联问题同整个国际关系和世界局势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记得1981年初李老召开过六次会议，提出将我国“文革”以后几年苏联出版的

午夜时分才抵达闽西连成，翌日晨起到屋外散步，抬眼望去，住地四周群山连绵起伏，时序已是冬令，山野依然青翠葱茏，有一股无比清新的气息沁入心脾。同行队友不无兴奋，纷纷举起相机、手机，笑语惊飞枝头鸟，“咔嚓”之声盈于耳。当地老乡据此断定我们初来乍到。

接连数日，我们这支由“一大会址”所在地上海出发的队伍穿行于闽西崇山峻岭之间，从古田去永定，经长汀到瑞金，别龙岩访才溪，一次次将目光掠过山巅，一次次投入大山怀抱。石门山、岩顶山、苦笋林尖、罗汉岭、笔架山、梅花山、将军山……闽西哟，山依偎着山，山簇拥着山。每每清晨和傍晚来临，群山在雾霭笼罩下变得沧海般辽阔壮美。每座山都让我们这些“朝圣者”心潮澎湃，景仰不已。

闽西的山是红色的山，是红军成长、壮大的摇篮。遍地的竹笋、野果，山坡上的红薯，成为红军战士果腹充饥的食粮；道道山梁沟壑、片片松林下，留下我军诸多高级将领当年战斗、生活过的足迹。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这里的山山岭岭充任了红军与白匪周旋的天然屏障。踏着曾经浸染前辈鲜血的一条条小路，我们在这片红土地上寻觅着，虔诚地阅读那风雨如晦岁月中的人和事。

我站立在上杭县古田镇采眉岭的笔架山下，眼前的廖氏宗祠早已还原到了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那载入党史、军史的尤为灿烂的两日。当时，120多位红四军党代表、士兵代表以及地方干部和妇女代表聚集在廖氏祠堂后厅，聆听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作的报告，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决议”。这熠熠生辉的决议，穿越时空，照亮了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征程，至今并将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行的路。

罗汉岭原本是长汀城西一座不高的山丘，如果不是与一位革命先辈相关联，它也许不会为世人所知晓。正午的阳光朗照着，我们缓步来到岭下，但见芳草萋萋，翠柏掩映，一块巨石上刻着“瞿秋白烈士就义处”八个大字。当年只有36岁的瞿秋白，盘膝坐于草地，面对行刑者微笑掷言：“此地甚好，开枪吧！”此情此景，恍若就在眼前。全体队员屏气凝神，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我们好像听见，枪声里蜿蜒的汀江呜咽低吟，古老的汀州肃穆致哀，好像看见当年岭上豺狼当道，乌云蔽日。英烈浩气，让罗汉岭定格为一座耸立于人们记忆里的巍峨高山。

1930年6月初，毛泽东在深入江西寻乌访访之后，继续赶赴闽西上杭草子崇山之才溪乡考察，往返三次，于1933年12月写下了反映基层实情和民众诉求的《才溪乡调查》。才溪人一直记得，攀越崎岖山岭，走过泥泞小道，坐在门口的石头上，跟他们拉家常，与他们膝挨着膝就着红薯喝白开水的这位瘦高个儿的红军干部，那样亲切和蔼，每句话都说到他们心窝子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才溪乡调查》闪烁着求真的光芒，为决心改变祖国命运的仁人志士树立了榜样。

闽西的山是丰饶的山。年复一年出产的“八大干”是对世代爱山、护山、敬山的闽西人的馈赠。虽然远隔千里，然而这里的山山水水始终与上海“一大会址”脉息相通。离开当地的时候也是午夜，群山已然隐在了夜幕的黛暗里，但在我们每位队友心中却越发变得清晰起来。大家笃信：惟有实干可兴邦，踏遍青山人不老！

有关中国的书籍归总一下，看看那里究竟讲了什么东西。我们用半年时间编成了一本十万余字的《简介和论点提要》。从编选原则、体例直至封面设计 and 字型选择，都是经李老反复斟酌并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他还亲自动笔，写了一篇气度恢宏、极富特色的前言，注明时间是1981年8月18日，当时李老已是七十八岁高龄了。

李老在中联部工作期间的卓越贡献之一，是实现了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拨乱反正。从1980年中至1981年初，在他领导和乔石副部长参与下，组织专门写作班子，向中央报送了涉及世界革命形势、国际共运大论战、欧洲共产主义、三个世界划分和存在的问题、苏联经济发展情况及其前景、新建的左派党和组织的情况和我们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等六篇重要文章。他还将他关于国际共运问题的一些思

考，于1979年10月在中央党校做了题为《关于国际共运问题的讨论意见》的报告。他见解新颖独到，理论性强，紧密联系实际，加之语言精辟，报告深受欢迎。

李老对后辈寄予厚望。他将所著《一氓题跋》、

工作、时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的长兄俞远书写了篇幅。

我从各种史料中得知李老孜孜不倦、随遇而学的故事。例如在皖南期间，新四军军部（他任秘书长）迁到歙县的岩寺，他想起明朝李日华《礼白岳记》关于岩寺的记载，尽兴抒怀。在苏皖边区，他开始搜集字画、瓷器，偶获刻有“小松所得”字样的笔筒，系黄小松遗物，爱不释手，相伴终身（所有这些字画文物后来都捐献给了国家）。1943年秋冬，他在苏北海海地区主持工作时，为了丰富文化生活，曾亲自组织一个京剧团，他本人还将当时在延安作为整风学习文献的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改编成京戏《九宫山》连场公演，曾轰动一时。

李老一生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是他数十年来刚正不阿、言必行行必果之源泉所在。直到晚年，李老仍保持自己动手查阅资料、撰写文章的习惯。他的文字清新活泼，不落俗套，自成风格，古籍专家们

没变，里面有没有变化？估计也不会有变！但打听下来，里面住的人倒是有了大变化，原住的楼上楼下老邻居，或配房或换房，先后搬走了，换了一茬，又换了一茬。宋代戴复古有《访旧》一诗：“欲寻西舍问东邻，两巷都非旧住人。唯有桑边石池在，依然春水碧粼粼。”此时读来，情景两合，颇易共鸣。单身前往，想在旧宅前留个影，却不用担心无人帮你按快门，因为同时有几拨人都是曾在这里住过，像我一样，手拿相机，来回走动，在过着怀旧瘾呢！

中国古代怀旧、访旧诗汗牛充栋，集中了作者的亲情乡情友情，如编一册专门的诗集，一定蔚为大观！

在心理测试的提纲上，往往把有怀旧意识作为人“老”的特征之一。其实，怀旧是人类的普遍情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只不过因经历丰富，可供回忆的物事更多，年纪大了更容易产生并乐于体验罢了。

怀旧是思想，访旧是行动。66年前，我出生在南市老城厢一个叫作“九亩地”的地方，具体说就是旧仓街春源里。因为是在家里接生的，那里是我真正的出生地，我的人生第一个卧具就是一只大大的木澡盆。明人刘溥有诗：“人家住近红叶村，红叶照水如春源”，春源，一个多好听的名字啊！但是，那片旧式石库门房子，在现在看来，实在太破旧、太寒酸了！我在19岁那年搬离春源里，47年来从未回去看过。去年，这个露露天块盼来了旧区改造的福音，顾绣的发源地终于迎来了春的消息，“源向春花几重”（王昌龄句）！考虑到那里即将被夷为平地，旧居不复存在，我在春节期间探访了那里。奇怪的是，在路上，我的心跳加快，脑海里自然而然地涌出了唐诗人宋之问的名句：“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渡汉江》），碰到老邻居说什么好啊！不过，这个担忧其实多余，因为动迁工作已经进行了一段时日，老房子还在，但居民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在空空荡荡的弄堂里，我找到了春源里30号的门牌，油漆斑驳的黑色大门紧闭着，想入无奈。我们原来住的二楼北厢房四扇大窗，默然对着我这个曾经的房客。窄小的夹弄多了原先没有的一排水斗和水龙头，是的，在半个世纪只增人口、不扩地盘的情况下，公共弄堂被充分利用也情有可原了！外观一切

朱雪琴是评弹流派唱腔“琴调”的创始人。琴调衍化自沈（俭安）调。在发展中，又吸收借鉴了俞调、夏调、小阳调等流派唱腔，以爽朗雄健为主要特色。

节奏是音乐的骨骼。琴调的节奏强烈、跳跃。她运用节奏来渲染气氛，也通过节奏来表达感情，塑造形象，营造意境。比如，她弹唱的《轻台报喜》，就用轻快的、跳动的节奏表现了作为小儿女的婢女翠苹的活泼机智。而具有“一曲百唱”特殊的评弹唱腔琴调，通过节奏的变化，既能表现欢快，也同樣能表现悲戚的感情。正是在琴调跳动的节奏里，朱雪琴往往恰当地运用停顿和延长表现出一种含蓄深沉的悲

戚感情。如她演唱的《梁祝·楼台会》中，“今生难以成连理，要想挽回难挽回，不如扶病把家还。”三句中，连用了两次停顿，一次在“要挽回”之后，一次在“把家还”之后，就在这两次停顿里，蕴涵了梁山伯的满腔辛酸。正如画家画水：“求假于物，以发其湍瀑。”她借助于这停顿，将心中压抑的悲忿之情，以湍瀑之势，喷发出来，给了听众以强烈的感染。

倘若说，节奏是琴调的骨骼，那末，气乃是其骨髓。唐代文学家韩愈说过，“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

浮，气之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

爽朗雄健朱雪琴

吴宗锡

感生发而成气势，气势又驾驭了唱调，机神所到，生气勃勃。

甩腔中，唱出了红旗迎风飘舞，满天映照的形象。《游水出冲山》中所唱的“一手托住战友身，一手划来两足蹬”，爽利遒劲，唱腔刻画出人物壮健有力的动作，和勇敢刚强的气概，形象鲜明。

朱雪琴在演唱时，很注意发挥其弹唱的表演性，她不但深入书情、人物，而且在演唱中，更配以富有表现力的手面动作，使听众在得到其听觉效果的同时，又补充有视觉的效果，遂使她的演出神采飞扬，气韵生动，给听众以强烈的感染。

徐丽仙认为，流派必须跟上时代。敬请关注。

评弹群星谱

水乡村韵

（中国画）

胡振郎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季氏篇载：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侍，陪侍，伺候。君子，应指尊长，包括长辈、老师、长官。愆，音牵，失误，过失。躁，毛躁，急躁。《论语》躁作傲，《荀子·劝学》“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亦用傲，至今许多学者坚持认为傲为长。颜色，脸色。瞽，音古，瞎眼。

用现代汉语重述此章：“陪伴尊长容易犯三种过失：话没轮到说而抢着说，叫做毛躁；轮到说而说不说，叫作隐瞒；不看尊长的脸色而随意说，叫作盲目。”

显然，孔子告诉弟子们在尊长面前如何说话，特别是掌握好说话的时机。不过，孔子不是正面告知，而是从反面给予警示。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话语更有力量。

说话，是人类本能，是人际交流、沟通的主要方式。谁都会说话，但说不说，怎么说，以及什么时候说等，效果却大不同。许多人熟知鲁迅先生在《野草·立论》中描绘的画面，三个客人对主人刚满月的孩子做出了不同的展望，得到了不同的回报：“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客人得到一番感谢；“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客人收回几句恭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客人遭到大家痛打，梦中“我”以小学生的身份想既不撒谎，也不遭打，请教老师该怎么说，老师告诉他：“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

上世纪初的众生相、世俗风，在鲁迅先生辛辣、幽默的笔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客人在主人给孩子庆满月的场合，应该讲求恰如其分的礼节。套用孔子的话，前两位客人的失误大约属于“隐”，说了好听话不着边际的话，虚伪；后一位客人的过失在“瞽”，说的虽是未来实情，但太不给人面子，莽撞。至于老师给出的答案，则是缘于世俗的圆滑和模棱两可，同样是不可取的虚与委蛇，其实也属于“隐”。

说话，起码有对象、场合、时机、语境等几个因素要顾及。前三个因素较易理解，孔子所说，即在对象已定的前提下强调说话的时机。所谓语境，应是总概念，除上述三个因素外，还指说话主题及气氛。以愚之见，“躁”或“傲”，以及“隐”“瞽”之病，不仅在尊长面前易犯，亦普遍见于各种说话场合。其中，尤以“隐”为最。传统习俗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舆论一律年代，更是套话、空话、假话大肆流行。真心实意被遮掩，真情实据被隐瞒，东西南北、上下左右皆如此。

先秦诸子大都重视说话问题，而最有研究的，其中就有法家思想家韩非。韩非说话口吃，口语表达欠佳，但却善于执笔著书，其《说难》即千古名文。清代一学者注曰：“夫说者有逆顺之机，顺以招福，逆而制祸，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以此说之，所以难也。”（《二十二子·韩非子》）其实，韩非主要讲向上进言的关键，在于了解君主的心理。

其说大概使司马迁深有感触，故太史公在《老子韩非列传》中置韩非诸多著作于不顾，只大段引用《说难》原文，且叹“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必须指出，孔子希望弟子们会说话的同时，又一再表明以“巧言”（公冶长篇）为耻。能说会道，溜须拍马，已是人品不佳，孔子十分厌恶。

诚恳、坦率，有礼，应该是孔子倡导的说话三原则。倘有适当的方式、方法与技巧，则更佳。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侍于君子有三愆」

白子超

白子超

白子超

白子超

白子超

白子超

白子超

白子超

白子超